

蒋洁敏率47家央企与安徽共谋发展

■ 本报记者 吴明 张晓梅 张骅

8月22日下午,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率47家央企负责人,参加了安徽省在京举办的“安徽省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推进座谈会”,并与安徽省与会人员就落实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对央企今后与安徽合作进行了部署和要求,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积极融入安徽经济大格局;二是在合作发展中实现转型升级;三是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安徽省省长王学军强调,要一如既

往地支持央企在皖发展,切实把与央企的合作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来推进。

安徽省副省长杨振超在通报与央企合作情况时指出,2009年以来,安徽省创新性地开展了与央企合作发展活动,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央企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截至2013年7月31日,该省共与81户央企建立了合作关系,累计签约合作项目881个,投资规模1.9万亿元。其中,开工项目601个,投资规模1.1万亿元,完成投资5369.1亿元,涉及央企70户;竣工项目191个,完成投资1452.3亿元,涉及央企48户。签约项目

开工率达到68.2%,开工项目竣工率31.8%。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47户央企与安徽省累计签约项目760个,投资规模1.6万亿元;开工项目521个,投资规模9255.5亿元;竣工项目178个,投资规模1149.4亿元。为进一步推进安徽省与央企合作项目,近期,该省以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为重点,组织相关部门对签约项目进行了全面摸排,深入查找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积极回应央企方面的诉求,并与央企相关单位进行了沟通协调,排出一年内有望开工的项目75个,总投资1524亿元,涉及央企37

户,全部为这次座谈会上的央企,作为当前合作推进的重点。

在座谈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石化集团、国电集团、华润集团、中国恒天集团、中国建材集团等6户央企先后发言。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说,安徽省有很强的后发优势,是央企大有作为的地方。中国建材无论在建材或医药方面都与安徽有合作,建材的成长我们是从安徽海螺那里学来的,中国玻璃产业的发源地也是在安徽蚌埠,这两块的研发和成套装备设计都在安徽,安徽是中国建材的重要支点,目前总投资在500亿元以上。

特别报道

京津科技谷:中国式“迪拜”引央企纷至

■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万斯琴

成立6年以来,京津科技谷共引进企业600余家,总投资超500亿元,正在促进和引领着天津武清区的转型与升级。实际上,它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这个央企和地方结成的超级组合正在发生强大的集聚效应。

“京津科技谷要名副其实,我们希望聚集京津两大都市最有价值的科技、人才、智力资源等优势,转变为环渤海乃至全国科技型企业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的首选载体,成为中国最大的科技型企业产业化基地。”8月21日,京津科技谷总经理刘钢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描绘科技谷未来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我们的最终梦想就是将它打造成‘京津之间的迪拜’。”面对记者,刘钢满脸自信地说道。迪拜是中东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未雨绸缪、永不满足、务实奋发是迪拜缔造奇迹的重要因素。如今的京津科技谷,已经成为一种影响科技型企业、影响未来生活方式的“迪拜式”的积极力量。



京津科技谷园区鸟瞰图

……”刘钢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

通过京津科技谷一个个板块的强力推出,园区被迅速激发、壮大起来。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产权一体化发展机制的形成,园区将适时地将金融和人才引进来,实现五位一体。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投资和运营成本,最大效率提高企业主业成长壮大,能够迅速占领市场,将园区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新商业畅想 “京津之间的迪拜”

京津科技谷诞生时曾被定义为“工业开发区”,但刘钢坚持认为,就算是工业区,也要有好的环境,适宜人们在其中工作和生活。曾经有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想进驻园区,刘钢毫不犹豫地否决了这一动议。

6年来,每当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科技谷总是以企业和人们工作、生活的良好环境为本,经济需要服从园区企业和居民的需要,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从没有资源,到再造资源,京津科技谷填补了本地经济的空白,使武清突破了“发展限制”,迅速走在全国产业园区建设前列。“实际上,我们的最终梦想就是把这打造成‘京津之间的迪拜’。”刘钢向记者谈起这个梦想时满脸自信。

早在2007年,刘钢就提出“田园里的都市,都市里的田园”的设想。如今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已经较为成熟的京津科技谷,正朝着刘钢当初对园区的定位而坚定地推进: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依托北京、天津雄厚的科技资源,以科技型企业产业化为龙头,带动京津两地教育研发同步发展,实现一种跨地区、跨地域、跨行政区域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

“这个定位不是心血来潮想的,而是经过反复论证的,京津两大院校、科研院所共1000多所,从科技角度,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刘钢解释说。他希望京津科技谷的贡献力不只体现在完善城市居住的休闲功能,丰富城市文化的旅游元素,更多的影响力应该是能够渗透到城市精神、公众意识与城市文化脉络中。

营造诗意的创业和人居环境,除了追逐绿色与自然,京津科技谷也在追求高雅。“在建园初,我们有一个宗旨:让投资者在享受创业的同时享受生活。千方百计把软硬环境搞好,改变传统开发区工厂聚集体的观念,打造中国当代科技型企业的产业新城。”刘钢欣喜地说。

求,“以中国钢研为例,实实在在说这是我们与天津滨海新区竞争来的。我们之所以能中标,得益于两条:一方面是有非常清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令中国钢研耳目一新;另一方面是我们优质的服务,给投资者带去的是一种真心实意,真情实感。”

“我们不欺骗人,起初园区配套设施不行,我们就得说实话。”谈到最初的困难时,刘钢向记者介绍说。事实证明,这种以减招商的方式为园区带来了新的合作伙伴,首钢集团功能性新材料研究院就是中国钢研介绍来的。

诗意地栖居 烫金的城市名片

如果没有京津科技谷,中小型企业不会和这座先天营养不良的城市发生如此亲密的接触;如果没有京津科技谷,武清不会有如此流光溢彩的一张城市名片;如果没有京津科技谷,许多人将从不曾料想“生态诗意栖居”可以变成现实……

京津科技谷栉风沐雨、昼夜兼程,以一个企业之力,建设了一座“生态的科技型企业产业化城”,将北京与天津之间的一片荒野滩涂变成了一座科技之城、生态之城、人文之城,提升和影响了一个城市的功能形象与精神气质,并成为一支引领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央企的入驻为京津科技谷带来了新的力量。而央企更是对京津科技谷发展中的几条模式津津乐道,其中之一便是“1+N”的发展模式。正是对产业领域选择的合理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成就了京津科技谷的高速发展。

“迪拜是中东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未雨绸缪、永不满足、务实奋发是迪拜缔造奇迹的重要因素。如今的京津科技谷,已经成为一种影响科技型企业、影响未来生活方式的‘迪拜式’的积极力量。

所谓“1+N”的发展模式,也就是在一个科技谷内建N个主题园区,每个主题园区都围绕一个或相近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在每个主题园区内统一建设以研发、检测、信息认证、外贸服务、技术交易等为主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满足各企业职工生活所需的吃、穿、住、行一体化设施的后勤保障服务平台,供所有人园企业共同使用,使企业专心致力于生产和经营两个主业,更快、更好地成长。

“到现在为止,这个园区科技型企业总体有600多家,基本形成了几个发展区块:一是新材料板块,特别是以中国钢研集团为主的金属新材料;二是航空航天板块,是以中航工业旗下的贵航集团北方基地和陕航天津基地为代表;三是电子商务板块,包括国美、苏宁云商等,仓储、物流、数据中心,呼叫中心等都放在这

祝愿《中国国资报道》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办出特色

王世忠

二〇一三年五月

观察



建设阳光央企 关键在于阳光监管

监事会监督只是对央企进行监督的方式之一,从根本上来说,建设阳光央企还需要财务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察监督以及央企的自我监督。

■ 赵玲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8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指出,加强国有企业监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建设“阳光央企”,要进一步推行由事后监督到当期监督、由境内监督延伸到境外监督的有效做法。

近年来,作为国民经济“顶梁柱”的国有企业屡屡传出经营决策失误、贪污腐败等问题,不仅影响到了央企的经营效益,也损害了央企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中远集团无疑是事后监督与当期监督、境内监督与境外监督失去平衡的典型。近日媒体爆料的中移动反腐4年14人落马,也与建设“阳光监督”的缺失有很大关系。

“阳光央企”正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提出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提出要加强对有国有企业的监督,建设“阳光央企”,无疑是把握住了央企问题的关键所在。

建设“阳光央企”实质上是建设阳光监督。现在,对中央企业的监督已经不少,但是有效性还远远不够。众所周知,央企监督工作的关键在于,社会各个主体是否有诚意创造出监督央企的条件。监事会监督只是对央企进行监督的方式之一,从根本上来说,建设阳光央企还需要财务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察监督以及央企的自我监督。只有社会各个主体共同为之努力,建设“阳光央企”才不会是纸上谈兵。

长期以来,隐藏在央企监督乏力背后的一个似是而非的原因是制度的失灵。从近年来很多违规现象的处理结果来看,问责的力度显然远远低于公众的预期。甚至在违规现象出现以后,一些央企倚仗着垄断特权和话语优势,造成监督无力。因此,只有将央企的管理真正地纳入到制度轨道,创新监督方式,加强常态监督,切实让监督落到实处,才能避免制度成为摆设。

中央企业的运转是有序的,对央企的监督也要规范有序。央企监督要与央企改革发展的步伐紧密结合,对企业的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央企的监督需要事后惩戒,但是却绝不能仅仅满足于“秋后算账”。监管部门要把握监督工作规律,紧密结合中央企业监督管理和其改革发展的实际,只有做到未雨绸缪,对央企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超前预判,强化当期监督,真正做到各级央企、境内外资产监督全覆盖,才能使得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达到最大化。

中央企业的自我监督是建设阳光企业的根本,建设阳光企业需要央企以身作则。社会监管的作用是有限的,不一定能做到面面俱到,这就需要中央企业有自我监督着手,敢于面对自身的种种问题,接受公众监督。比如企业职工的薪酬收入、企业领导的职务消费、企业管理的漏洞等。尽管如今的央企规模越做越大,但不少央企在自我监督这一点上做得还远远不够。

由于垄断特权的烟雾笼罩,加剧了央企自肥欲望的膨胀。而要革除这方土壤,最有效、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增加央企的社会能见度。相关的制度执行,只有在能见度高的道路上行驶,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要保障央企监督发挥应有的效力,提升央企的社会能见度,或许正是“阳光央企”从梦想照进现实的关键所在。

在近日闭幕的第十三届亚布力年会上,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演讲时认为,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办法。为了避免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化的改革,实行阳光化。这对我们的“阳光央企”不无启发。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建设“阳光央企”,正是对提高国资监管水平、促进央企科学发展的更高要求,是对社会各界呼吁的回应,也是对改革的推进。只有完善制度保障,让制度发挥作用,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中证中央企业综合指数(2013年8月20日—8月26日)

